

20 世纪初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

王笛

(德克萨斯 A&M 大学历史系, 美国)

摘要: 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 因此他们在对待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 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 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 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 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 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 然而, 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 充分显示了其极为茂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 茶馆, 公共空间, 社会歧视, 改良精英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地的研究, 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人们在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 认为这些地方给朋友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 并不一定只为上层服务, 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因此, 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 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丰富复杂, 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的范围, 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 亦为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并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这篇论文将以成都为对象, 考察茶馆这个 20 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经济文化单位, 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

黄炎培先生民国时期访问成都时, 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 其中两句是: “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 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 30 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 在茶馆里, “无论那一家, 自日出至日落, 都是高朋满座, 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 “住在成都的人家, 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

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 G. 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以至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用茶馆为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一、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竭力择址在有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之地，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

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以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们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笼快而且利润不菲。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三件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却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即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或“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

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 20 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

二、市民的“自由世界”

在 20 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ing saloon)，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他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他或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他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他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人们经常还可以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据 1943 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隐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 A. 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 J. 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 20 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不赖寂寞的人们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们增添了乐趣。

茶馆也是一个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每当夜晚，当穷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去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唱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是其语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

三、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其“绝技”来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以此我们可见小贩不仅出售他们的商品，也给茶客们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其数尺长的“烟枪”提供他们的服务，如果那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所需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的回忆录，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使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他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赏那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着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无客可会，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他们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30、40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 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在茶馆里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爱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

商人们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当然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韩素英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们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即在一个民事诉讼形成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任何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

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作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弥。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

吃讲茶有时也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晚清成都警察建立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吉力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恨。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

四、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们间的“相对平等”。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在 1931 年茶馆大约有 500 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唯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

在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们有他们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进茶馆。即使在严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力图侵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 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并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的批评。

在 20 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 30 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

五、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 1911 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燥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气氛，人们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英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所谓“情报”来惩办它的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一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民国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

“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 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止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显然，人们对这部美国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国自己的处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被翻译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当保路运动爆发，川督赵而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 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作抗议。1928 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稽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的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产生出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达到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在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他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

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

六、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亦可为鸡毛蒜皮，而且更多地起缘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于拥挤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作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也可因赌博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是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挡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偷茶碗之事屡见不鲜。但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茶客们看热闹的机会。有一次，200 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茶馆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青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茶馆亦成为那些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们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得一无是处。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 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 年警察制定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十点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九点以前停止。1921 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的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 和 1932 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病、性病以及其它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

在 30 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六个小时。40 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但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从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在 1932 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它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愿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扩展它们的范围进入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1929 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这导致了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赌博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甘冒被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而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其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 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的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七、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不仅被当时精英而且尔后的学者误解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人们忽视了其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建立与其同党的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他的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维持生计。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承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处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政权，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对待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政府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其极为茂盛的生命力。

The Cafes And Chinese City's Social Life In Early 20Century

Wang Di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exan A&M University,,America)

Abstract: City reformative elite ha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er understanding to popular civilization than the government, so they have a distinct attitude with the government about how to deal with cafes. It supposes the main measur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cafes is controlling and shocking, then what the elite would do? They would criticize the cafes'disadvantage, but also know the cafes'social

function actually. So they don't agree to the government's Jacobinical reform what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of why the government's action always can't achieve it's scheduled effect. It seems that the cafes as well as the cafes' civilization are weak, are always restricted and shocked, however, the cafes can alive at last and still is the most active part of the city daily life which reveals its flourishing vitality fully.

Key words: the cafes, the public sphere,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the reformative elite

收稿日期: 2005-09-10

作者简介: 王笛, 男,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